

## 共识，协商或论辩

郑惠芳

联合早报，2014年3月9日

意本郑经在目前这个资讯年代和全球化环境里，到底要取得共识治国，是协商较理想还是应走向公开论辩呢？农历新年前，政策研究所在以“差异”为主题所举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设计了一场辩论会，邀请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蔡明发教授担任正方，以及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纪梭教授担任反方，对垒辩论“共识而不是论辩能确保新加坡有个巩固的未来”

（ **Consensus rather than contest will secure Singapore's future** ）。由于是由主办单位委派立场，因此论辩内容未必代表教授们的个人意见，本文谨以正反方来阐述。

在辩论开始前，与会的600多名来宾，包括公务员、学术人员、企业界人士、公民团体代表和学生代表等，单就论题进行了投票，结果大多数人认同正方的辩题，觉得协商较有利于新加坡的未来发展。

辩论开始不久，论辩双方表明他们在两点持相同看法：现今新加坡已无法以高压手段管制不同的声音，共识必须由下而上达成。另外，2011年大选显示了分水岭，网上平台和资讯的发达构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环境与局面。双方的分歧在于达成共识的过程，正方觉得对峙交锋会凸显各种差异与分歧，即使当权者用心良苦面对挑战，也未必能够控制局面；而反方则认为，真正的共识唯有在针对差异进行辩论后才会产生，没有经过交锋所达成的“共识”最终必有反弹并积累怨颯。

第二轮投票结果，反方论题得到多数票支持，即认为交锋辩论更有利于新加坡的稳固发展。

在观众提问和辩论员总结的环节，反方重申，由于资讯媒体的发达，隐藏各类差异的机制已瓦解。在面对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国人有信心，即使进行公开辩论，只要政策是好的，理智的国民仍然会支持。

反方总结，我们必须消除以为国人一定会采取极端立场的恐惧，从而把讨论从闭门会议搬到公开场合，同时不能急躁地腰斩论辩过程。反方举例说明，就如一名与会者所说，许多国人不了解马来族的文化和价值观，那是因为文化、宗教与族群的差异往往都被躲到闭门会议后面讨论，而没有经过公开论述的洗礼。

正方则认为，新加坡在过去40年都处于一个特别的泡沫里，没有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因为公开争辩类似语言等硬课题而造成社会分歧，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无需做这样的决定。同时，要取得共识，必须有所牺牲，各利益团体不能强硬坚持各自的立场。正方也提醒，公开交锋未必一定有圆满收场，也有可能出现既得利益者煽动人群偏私己方利益。

最后一轮投票结果，支持协商共识治国的正方取得了多数票。

这是一场辩论比赛，即使是在一个专题会议上进行，仍难免会有表演的成分。论辩双方必须以各自的论据争取支持者，难免只提利于己方的论点而不讨论事件的全貌。且不论辩论的比赛成分，我们能不能借这场辩论会思考国家未来的治国方针？在目前这个资讯年代和全球化环境里，到底要取得共识治国，是协商较理想还是应走向公开论辩呢？

建国 50 年在即，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让与会者通过对共识治国的主题，认识并思考不同的观点与立场。其实，从根本意义上来看，协商讨论和交锋论辩都是达成共识的工具，这场辩论会也确定了这个概念。

个人看来，这场辩论的重点，在于对全民投入的理解和拥护程度（与民协商程度的课题早在 1997 的《新加坡 21 世纪展望行动》中提及，是否在寻求共识和磋商的同时，也能当机立断）。一方的论点从现实角度排开，认为当今内外因素造就更多、更尖锐的差异性，另考究其他国家处理差异问题的（多数）失败例子，我们还是遵循过去行之有效的精英与民协商的方式继续主导国家的治理，因为全民参与的公开论辩过程未必能形成对国家与人民最有利的局面出现。

另一方则抱持较乐观态度，表示对国民理智思考与处理难题的能力深具信心，并觉得没有必要总是让恐惧与危机意识牵着鼻子走，因为一个成熟与理智的国民体，肯定能对国家的政策制订做出贡献，而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追回失去的时间并顺应时势，争取机会锻炼论辩技巧以达磨合成效。

曾有专家测量新加坡人的国民性，发现他们是刻苦耐劳的一群，在顺境时会表露忠心却也可能多虑与消极。如果这个测试准确的话，那不难解释为何这场辩论正方最后获胜。但与此同时，也似乎提醒我们更应该积极锻炼国民较弱的正面论辩能力。你做好准备为你支持的理念进行公开辩论了吗？你愿意去听并尝试了解与你意见相左的论点吗？

**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Please click [here](#) for English version